



复旦文史专刊之五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西文文献中的 中国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11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 - 7 - 101 - 08853 - 3
I. 西… II. 复… III. 中国历史—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914 号

书 名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胡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406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53 - 3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序	葛兆光(1)
自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	夏伯嘉(3)
从《大航海时代丛书》看日译耶稣会史及东西方关系史 文献的基本特点	戚印平(17)
早期西文文献中的官话与方言	韩可龙(29)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董少新(51)
中西合璧的手稿:《谟区查抄本》(<i>Boxer Codex</i>)初探	李毓中(67)
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	毛传慧(83)
荷法文献中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蔡香玉(105)
16 世纪葡萄牙海外文献中关于中国贸易的记载	张廷茂(121)
西班牙塞维利亚印地安斯档案馆收藏有关 中非贸易史料的概况	方真真(133)
18 世纪至 19 世纪前期西文文献中的对华贸易	范岱克(163)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研讨会实录	(193)
附录:16—18 世纪中国天主教史西文原始文献概览	高华士编 董少新编译(269)

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

毛传慧^①(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世纪以来,一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居民,法国人也深深为来自远方,被称为“Cathay”之遥远国度的精美商品所吸引。然而海权时代初期,法国由于缺乏庞大的资金,以及足以远赴重洋军事武装的坚固船队^②,一直无法介入印度洋海域的市场,与其他欧洲海权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角逐足以获取暴利的贸易利益。

17世纪末开始,在诸位大臣的持续努力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政府终于摆脱长期财政赤字的危机,进而跻身欧洲霸权之列。特别是在财政部长

① 笔者在此感谢本校增能计划“清末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99N2925E1)”和人文社会中心季风亚洲计划的经费支持,让笔者得到法国数个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资料的搜集,完成初步的整合研究。

② 当时的海洋贸易通常混杂着海盗行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年纪录中即有相关的记载,见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t. I, p. 1—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页1—14)。路易·戴弥尼(Louis Dermigny)的博士论文对此亦有所论述,见氏著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S. E. V. P. E. N., 1964, t. I, pp. 92—103。除了卓越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以外,强大的武装设备和丰厚的资金,亦是在印度洋上角逐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17世纪初的法国,尚无足够完善的造船技术,通常必须向荷兰造船场定制所需的远航船只。

(contrôleur général de finance)科罗贝(Jean-Batiste Colbert, 1619—1683)^①施行的一系列发展艺术、工艺、科学、技术和商业的政策下,法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工商业均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17世纪末,当葡萄牙朝廷因财政匮乏而不得不放弃对遣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赞助权时,法王决定接手承担派遣耶稣会传教士使华的经济支持,而开启了中法间直接交流的序幕。

耶稣会士出使中国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让远方国度的“异教徒”改宗天主教,然而法国政府更希望藉由传教士亲近中国皇帝的机会,取得在中国内地旅行的特权,就近搜集各种中国传统工艺的制造“秘密”,并取得与帝国通商的特权,建立中法间的通商关系,才是法国国王愿意提供遣华耶稣会士赞助的主要动机。1688年,首批法国耶稣会士抵达清廷并获得康熙的重视,不但取得在中国境内自由行动的特权,得以在中国各地进行观察与资料搜集,并在东印度公司人员的协助下,将丰富的讯息、资料与报告送回巴黎,成为欧洲人对此声名远播而又神秘非常的遥远帝国的知识来源,对启蒙时期(Siècle des Lumières)的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透过耶稣会士的介绍和广州的对外贸易,欧洲的知识、文化和文物、商品亦在皇室成员、贵族和文人间流传,广州的行商和手工业者亦受到西方的影响,从18世纪中国的科学、艺术、医学、宗教、手工业生产等面向均可观察到东西交流的痕迹^②。

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在罗马教廷和巴黎上演的“礼仪之争”却越形激烈。耶稣会在法国拥有的特权和财富,引起社会的舆论;政府在人民敌视教会的情绪高涨下,亦急于摆脱罗马教皇的影响力。处于世俗权力和教皇国压力夹缝中的耶稣会,在财产为法国政府充公后,1773年又遭遇教宗克雷蒙十四(Clément XIV)下诏宣布解散的命运^③。在法国政府控制下,派遣使华传教士的任务虽然由外方传教会(Mission étrangère)接管,然而

① 科罗贝出身于汉斯(Reims)的商业、银行家族,1648年被任命为国王参赞(conseiller du roi)。由于马札函(Mazarin, 1602—1661)去世前向路易十四推荐,而于1664年出任皇室宫殿总管(surintendant des Batiments),并于次年升任财政部长。科罗贝倾向于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工业的发展,并采取保护政策的措施,以支持工业和贸易发展;同时强调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于1666年成立法国科学院,次年建立天文台。1669年,科罗贝成为路易十四的内务府大臣(Secrétaire d'Etat de la Maison du roi)。1671年,因试图重整皇家财政,而与军事大臣(secrétaire d'Etat de la Guerre)卢瓦(Louvois, 1641—1691)对立,在后者的阴谋设计下,科罗贝失去路易十四的宠信。1683年去世后,其职务由卢瓦接掌。

② 相关详细内容可参阅参考书目中的著述。

③ Henri Cordier(高迪爱),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documents inédits* (18世纪在中国的法国,未发表的文献), Paris: Ernest Leroux Editeur, 1883, 页168。

18世纪中西政治、社会的变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消长,导致西欧对中国的评价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使华传教士的心态和肩负的使命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④。19世纪初,随着法国最后一位驻广州领事离华,中法间的直接交流亦随之呈现停顿状态。

中国在第一次对英鸦片战争中失利,以及随之签订的南京条约,让法国政府觅得再次派员来华调查的契机。1844年初,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er})援引英国和美国的前例,派遣使团来华签署第一个中法条约,数个重要城市的商会要求法国政府借机组成附属商业考察团,随同使团前来对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和消费市场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希望与中国建立商业贸易关系。经过17、18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发展,欧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注意焦点,由之先前对精美手工制品的渴望,转为从中国获得丰富而价廉原料的想望,以及中国具有潜力的庞大消费市场的觊觎。

19世纪下半叶,满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军事交锋时连连失利下,接连与各国签订通商和互惠条约,相继开放沿海和长江口岸,西方势力得以深入中国内陆,法国在华调查亦随之公开化,且深入中国腹地,调查人员的身份背景、调查目的、性质及方式亦随之改变;19世纪末,西方列强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与激烈的科学竞技,加上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法国在长期对中国研究与知识累积的基础上,藉助19世纪发展出更精密的仪器与工具,以及为数更多的来华人员共同努力下,对中国社会、种族、地理、自然资源及文化进行更为深入而广泛的调查。

长期以来,法国耶稣士在华进行的调查活动,及其对中西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交流所付出的贡献,受到许多现代史学家们的注意,留下相当丰硕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的研究着重于透过在华耶稣会士而完成的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文化技术交流,尤其是科学(数学、天文学)、医药、哲学、技术(蚕桑丝织、

④ 有关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历史背景研究,诸多学者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论述的层面除根据不同时期派遣来华的传教士背景、理想和方式有深入探讨外,对各国不同的教会精神与背景,及其目的与方式,已有深入的分析。贾永吉(Michel Cartier)主编的第十八届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La Chine entre amour et haine, actes du XVIII^e colloque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Paris: Institut Ricci, 1998*)收入多篇从宗教、政治、社会等层面深入分析探讨欧洲从“亲华”态度转变为“仇华”姿势的背景与原因的论文。

陶瓷、玻璃、漆器、水利、钟表)以及艺术(绘画、音乐)等方面^①;少数几位学者将交流的内容与“国王的数学家”^②收到的《卢瓦的调查问卷》进行比对,试图了解来华耶稣会士调查活动的背景与影响^③。然而仅有极少数的学者针对“法国对华调查”——笔者意指针对考察团的目标、方法、使团成员、调查结果与影响——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考察;至于19世纪法国在华调查则尚未引起现代史学家的注意。然而,这些法国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对华调查与观察,包含的面向相当广泛,非但搜集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丰富的讯息,并对中国的科学、手工业技术等进行实验与研究,提供中国文献史料所忽视或秘而不宣的一些层面或史实的纪录,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亦有不同角度的叙述与评价,得以补充中国传统史学记载的不足。

透过对近代法国在华调查系统的考察分析,除了可从不同角度的观察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得以深入分析检视近代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的轨迹与交互影响,将中国历史的研究置于世界史与全球贸易的背景下,进行全面的观察与分析。

本文将针对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在华所进行的调查,作一整体的初步考察,藉此对中法关系演变的历史背景作粗略地勾勒,同时反映出两国科学技术与生产能力和国力的消长,对法国派遣考察团目的和内容的影响,进而阐述法国文献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

法国在华调研的目的、内容、进行方法与成果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今

① 例如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Ronan(Charles E.), S. J. et Oh(Bonnie B. C.) (é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e(Thomas H. C.) (éd.),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ashimoto(Keiz), Jami(Catherine), Skar(Lowell) (éds.), *East Asian Science: Tradition and Beyond,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Kyoto, 2—7 August 1993*, Osak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路易十四给与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的封号。1685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于伯黑斯特(Brest)出发,于1688年抵达北京。随行尚有派遣到暹罗的耶稣会士Guy Tachard(1651—1712)。

③ 提议派遣访华耶稣会士的科罗贝已于1683年去世,由接管其职务的卢瓦完成耶稣会士的派遣。卢瓦的问卷在康熙派遣白晋回法国选取更多的耶稣会士科学家时,交给白晋带回北京。关于当时历史背景更多的细节请见Isabelle 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 -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该著述的中文翻译计划正在执行,不久可望见到中文译本。

依据中法关系的演变,将法国对华调查分为三个时期:一)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主要透过在华耶稣会士进行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知识、手工业生产的调查和资料搜集;二)19世纪中叶:自中英关系开始紧张以来,路易菲利普一世政府即派遣大量驻外人员和海军,对中国海域的情势和经济贸易进行资料搜集,而拉萼尼使团(mission de Lagrenn, 1843—1845)的派遣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法近代外交关系正式缔结的开始。此时期的考察着重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情势,以及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的能力与倾向;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1885年中法越南条约的签订,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权,而保胜、谅山的开放通商更满足法国长期以来希望由中南半岛进入中国腹地的夙愿,19世纪末以降,西南地区的资源和地理考察为法国调查重点之一。

一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华耶稣会士的调查

17世纪末,法国经过马札函、科罗贝等多位大臣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窘态,并奠定向海上扩张的军事力量与技术发展,一偿进军印度洋海域,角逐远东市场庞大利润的夙愿。

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和帕吕主教(Franfried Pallu, 1626—1684)^①的建议以及财政部长科罗贝的支持下,法国接手葡萄牙因经济衰退而放弃的对遣华耶稣会的经济支持。法王希望藉由耶稣会士的派遣,与清朝内廷建立直接交流的管道,并获得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和与中国通商的特权,以搜集中国手工业、艺术的技术与相关知识,以及有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讯息。1685年,路易十四终于派遣了被诏封为“国王的数学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的五名耶稣会士,于1688年抵达北京。

虽然17世纪时,法国在科学技术上已有惊人的进步,并成为欧洲主要霸权国家之一,但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以及农、工业生产和海上贸易仍有待加强与改进。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精美商品,以及关于这块乐土臻于完美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描述,让欧洲思想家心神向往,而成为西

① 详细内容见载于1672年6月4日帕吕写给科罗贝的一封信中:Pallu, à Colbert, le 4 juin 1672, t. II, p. 231, 引自 H. Bele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中国热)*, thèse de doctorat d'université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Jouve et C^{ie}, 1910, p. 14。

欧摹仿的对象^①。科罗贝在筹备访华耶稣会士的派遣时,特别要求耶稣会士在中国期间,尽可能利用传教以外的时间,大量搜集、考察有助于法国发展科学和工艺的中国知识、技术和艺术的讯息^②。科罗贝在有生之年并未如愿见到遣使华耶稣会士的派遣,而由他的继任者卢瓦完成。新的财政大臣为遣华耶稣会士准备了大约一百个涵盖中国社会、历史、地理、政治、系统、传统、文化、技艺以及自然产物等面向的问卷,成为在华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观察与资料搜集的方针。1696年李明(Louis Lecomte, 1655—1728)出版的《中国近事报导》(*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回应了鲁瓦问卷的内容,将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建置、知识、医学、物产和生产技术做了全面而简要的报导。18世纪上半叶,未曾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整合了在华耶稣会士寄回法国的书信和报告,出版了《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 la Chine*)^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知识技术作更深入而系统的介绍。除此之外,在华耶稣会士并竭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书籍、样品和器具,利用返回欧洲的机会,或经法国东印度公司

① 有关此现象的研究,请参阅 H. Bele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thèse de doctorat d'université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Jouve et Cie, 1910;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2;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Texas: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 2 vol. in 1; 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3.

②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Toulouse: Imprimerie Noël-Etienne Sens et librairie Auguste Gaude, tome XVII, p. 67: “Les sciences, mon Père, ne méritent pas que vous preniez la peine de passer les mers, et de vous réduire à vivre dans un autre monde, éloigné de votre patrie et de vos amis. Mais comme le désir de convertir les Infidèles, et de gagner des âmes à Jésus-Christ porte souvent vos Pères à entreprendre de pareils voyages, je souhaiterais qu'ils se servissent de l'occasion; et que dans le temps où ils ne sont pas si occupés à la prédication de l'Évangile, ils fissent sur les lieux quantité d'observations, qui nous manquent pour la perfection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神父,科学并不值得您千辛万苦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地到远离亲友的另一个世界生活。然而在使异教徒皈依和在耶稣基督之名拯救灵魂的神圣使命驱使下,神父们经常被委派类似的使命。我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在他们宣传教义的任务之外,得以在当地对有助于改进我们科学和工艺的讯息,进行大量的观察。)

③ 书名全名为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ibet et de la Corée*, la Haye, chez Henri Scheurleer, 1736 (2e éd., 1ère éd. en 1735), 4 vol. 法国学者 Isabelle Deron-Landry 曾针对该书的内容与卢瓦问卷的内容进行比对。

海商的协助,将资料和报告送回法国。

耶稣会士借着得以与清朝皇帝、贵族以及文人接触的机会,以及在中国内地旅行的自由,交换或搜集书籍和植物种子,并四下搜寻有用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士人的合作下将涵盖广泛领域(如文学、医药、哲学跟科技等)的中国经典文献译为拉丁文或法文;同时对中国生产制造的工序(如野蚕放养、丝织跟陶器制作)进行实地考察或直接请教工匠。与此同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冒险家亦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调查,最著名的是1748年至1757年间担任东印度公司海商的皮耶·鄱佛(Pierre Poivre, 1719—1786),他曾于1754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员(Correspondan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鄱佛对于农业和纺织的制造技术,以及染色植物与染色的工序特别注意,曾出版相关的报告^①。

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期间,正值欧洲启蒙运动的巅峰。除了法国科学院院士以外,耶稣会士还与其他欧洲和苏俄的学者有书信往来,针对通讯学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进行资料的搜集和实地考察,并将大量的资料借着书信往来寄返法国和欧洲,提供西欧现代科学发展丰富的讯息与实际经验,对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②。除此之外,中国的建筑、庭园和装饰艺术更在欧洲掀起热潮,而有“中国风”(la chinoiserie)的兴起,现今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仍可瞥见受到中国风格影响的亭台楼阁与建筑,与此相关的论述非常丰富^③。

1727年法国海事部长暨东印度公司总裁曾要求教廷传信部(Congrégation de la propagande)“停止运用权力召回北京的耶稣会士,以免

① 里昂科学院档案馆(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 Lyon)和里昂自然科学博物馆附属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的档案中有数个鄱佛捐赠的纪录。部分他旅行的回忆录已出版: *Voyage d'un philosoph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œurs et les arts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de l'Asie et de l'Amérique*, Yverdon, 1768; *Voyage de Pierre Poivre de 1748 jusqu'à 1757 (1748至1757年间皮耶·鄱佛的游记)*,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8; Louis Malleret, *Les mémoires d'un voyageur: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Pierre Poivre (一个旅者的回忆录,皮耶·鄱佛未发表的手稿)*,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8, pp. 1—10.

② 潘吉星在其著述中提供数个例子;毛传慧在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ériciculture chinoise, fin XVII^e-fin XIX^e siècles (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法国对中国蚕桑业的调研)*,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Centre historique de documentation des techniques, 2007, nouvelle série n° 14, pp. 24—36一文中,曾以蚕桑为例,进行深入的分析。

③ 可参阅 Jacobson (Daw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3; 黄时鉴:《维多利亚时代的图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破坏这个耗费了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经营的虔诚成果”^①。然而，在法国社会对罗马教廷和耶稣会士日益高涨的敌视气氛下，法国最高法院终于1762年宣布撤销耶稣会所属学校和会所，并将耶稣会财产充公；同时取消耶稣会遣华教士选派的任务，而由外方传教会取代。虽然当时驻华的耶稣会士获得内政部长贝赫丹(Bertin)的财力支持而得以继续驻留北京内廷^②，但其在华活动的范围则大幅度地缩减，就地对中国进行的观察亦随着人员的减少而受到局限。随着最后几位留驻清朝内廷耶稣会士的逝世，中法内廷间直接的文化、科学技术交流亦随之中断。

在对华贸易方面，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起步较其他西欧和北欧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稍晚，且限于法国保护本国纺织业法令的限制，在远东获取的贸易利润虽然远不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但法国商人利用中国丝绸换取东南亚香料和染料，以及金、银等贵金属的贸易，虽然获利远不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印度生产的鸦片、原料和铸造银币在东南亚贸易来得庞大，但利润仍相当可观。直到1769年，由于舆论的争议，路易十五下诏取消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远东贸易特权，该公司才难逃倒闭的命运^③。1776年，路易十六试图在广州设立法国领事馆，下诏重组商馆，并任命首任领事(consul)^④；然而由于领馆人员待遇过低，再加上广州地区人员的权力纷争，领事馆的创设困难重重^⑤。1801年，随着法国驻广州最后一位人员小德金(De Guignes fils, 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① Lettre du ministre de la Marine et le Directeur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l'abbé Ragué (海事部长暨东印度公司总裁哈给的一封信)，引于 Camille de Rochemonteix,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钱德明与驻北京的最后几位法国传教士), Paris: Librairie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1915, p. LI-LII. 原文如次：“cesse d'employer son autorité à faire rappeler l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et de détruire une oeuvre si pieuse, qui a coûté tant de soins, de temps et d'argent”。

② 在耶稣会的财产被充公，其派遣使华教士的任务为外方传教会士接手以后，仍有最后一批旅华耶稣会士受到法国大臣 Bertin 的支持，继续留在清宫内廷，但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北京及近郊。

③ 有关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可参阅法国学者 Philippe Haudrière 的著述，如：*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Trois siècles de rencontre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eds: Desjonqueres, 2006。

④ 细节详 Henri Cordier, *Les origine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 Extrême-Orient, Chang-Hai-Ning-Po* (法国在远东两个机构的起源：上海和宁波)，Paris: [s. n.] 1896, 页 XXIII—XXV。

⑤ Henri Cordier, *Les origine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 Extrême-Orient, Chang-Hai-Ning-Po*, 页 67—75。

Guignes, 1759—1845)^① 的离华，领事馆即终于陷入真空状态^②；直到1828年“航海号”(navigateur) 船难事件发生，法国政府才任命海商杰纳邨(Benoît Gernaert, 出生于1792) 为领事，专门负责与广州官员的交涉事宜^③，但杰纳邨大半时间仍居留于澳门，法国广州领事馆形同虚设^④。

19世纪30年代末，当中英关系日渐紧张之际，法国政府开始派遣外交人员和海军在南洋就近观察，并于1839年创设驻菲律宾总领事馆(consul général)，任命巴厚(Théodore—Adolphe Barrot, 1803—1870) 为首任公使，以便就近密切注意远东局势的发展^⑤。

二 拉萼尼使团(1843—1845)

法国在对英七年战争(1756—1763) 失利后，失去了在印度洋绝大部分的据点，法国在该海域的影响力从此顿减。虽然第一帝国(Premier Empire, 1804—1814) 的部分官员呼吁政府重建与中国的通商关系，然而终不抵反对派主张发展农业、工业及国内市场的声浪而作罢。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可重见法国尝试发展远东贸易的努力。1824年布冈维勒男爵(baron Bougainville) 受政府委任远赴交趾支那(Cochinchine)，试图重建法国在远东的商业网络；同年，法国政府亦曾尝试组织派遣访华使团，且于次年任命驻华领事，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对法国在远东商业关系的重建有任何助益，出现在广州的法国商人仍寥寥可数。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予法国政府争取在中国享受同等商业利益提供可模仿的前例。1843年初，法王路易菲力普一世决定派遣大使前往中国协议，并签署通商与航海税则的条约，任命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 1800—1862) 为全权公使(plenipotentiaire)，随行的使团团员有：海关总督伊提叶(Jules Iti-

① 小德金(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 的父亲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有名的东方学家 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

②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 Extrême-Orient (1841—1846)* (1841至1845年让希尼的远东任务)，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6, p. 29. 德金取道北京返回法国，留下此次旅行的游记：*Voyage à Pé-King [Pékin] de Guignes* (1808)。

③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 Extrême-Orient (1841—1846)* pp. 29, 33; Charles Sola, op. cit., p. 33.

④ W.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旧中国杂记)，页 207。

⑤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 Extrême-Orient (1841—1846)*，页 30—31。

er, 1802—1877)和巴希庸(Mallat de Bassilan, 1808—1863)医生等。伊提叶主要负责有关税则与税率方面的考察,而后者则负有在印度洋海域寻找在中国领土以外可作为法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港口基地之秘密任务^①。其实稍早之前,让希尼(Dubois de Jancigny, 1795—1860)^②即受命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其目的主要在与中国缔结通商关系,并于中国官员面前展现法国的海军武力。让希尼利用此机会协商与中国的通商条约内容,而引起广州、澳门国际舞台的议论^③。

较为现代学者所忽视的,是拉蓐尼使团的附属考察团。在法王决定派遣使华签订中法条约后,在几个重要城市商会的敦请下,法国农工业部大臣亦筹划利用派遣访华使团的机会,组织商业考察团(délégation commerciale),以建立与中国农业和工业交流的关系,并从当时法国最重要的工业中挑选四位专家代表:爱德华·何纳(Edouard Renard)为巴黎奢侈品工业的代表,纳塔力·洪多(Natalis Rondot, 1821—1902)为羊毛工业跟香槟酒制造业的代表,欧古斯特·欧斯曼(Auguste Haussmann)为棉业代表,以及代表丝绸工业的伊斯朵尔·赫德(Isidore Hedde, 1801—1880)。商业考察团访华的主要目的在于与中国以及位于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国家建立商业关系;此外,尚有在中国搜集有助于法国农工商业发展的生产技术和商业讯息的任务。行前,代表们收到农商业部长对此次任务明确的指示,以及有关中国和南亚贸易状况的大量资料^④;代表们并收到调查中国和南洋地区国际贸易和中国市场状况等种种任务的明确指令:除了调查不同国家船只进口及出口量(每个港口的航务情报、不同国家每艘船只的详细讯息,以及进出口货物的内容、性质),还必须对当地生

①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Paris; G. Olivier, 1847, p. iii.

② 让希尼(Adolphe Philibert Dubois de Jancigny)是达耶斯蒙(Jean-Baptiste Daesme, 1763—1832)将军之近亲,达耶斯蒙死前将其推荐给法国政府。让希尼在第一帝国时期曾参加几场战役,1829年以前,曾在东印度地区旅行,并担任阿瓦德国王(King of Awadh, Naqr ed-din Haidar, 1827—1837在位)的亲兵,并被派遣参加欧洲的使团(1834—1835)。让希尼在《双世界周刊》(*Revue des deux mondes*)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亚洲的文章而名声大噪。

③ 有关此事件的过程,可参考葛夫平:《法国与鸦片战争》,《世界历史》,2000年5月,页50—58。

④ 1843年11月23日,农商部秘书交给拉蓐尼五份文件:1)1843年10月1日的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整体情况的调查报告;2)摘自比利时领事报告的有关中国贸易的摘录;3)一份有关巴黎出口的声明;4)1842—1843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整体调查报告;5)英国国会宣布香港为免税港法令的法文译本。Cf. AN, F12 / 2589, S. M. l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à M. de Lagrené,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u Roi en Chine, le 23 Novembre 1843. 指示同时出版于 *Faits commerciaux*, n° 3, pp. 19—28.

产和制造状况(制造的工序、染色跟整染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并观察劳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林业、矿产和农业等资源生产和买卖的状况。海关总督伊提叶带着当时新进的照相器材来到中国,因一系列在广州拍摄的照片而名留中国摄影史;然而学者们较少注意到的是他留下来的关于中国手工业生产的观察描述,以及返国后在法国南部对法国和中国织品纤维生产方式所进行的对照比较试验^①。为了开发法国酒业在中国的市场,伊提叶随行还带了样品酒,在亚洲地区进行“市场调查”,对华人的饮酒品味和消费习惯进行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并提出投合华人口味、消费能力和包装的,具有“现代行销”概念的方法,设法将法国酒打入中国市场^②。

使团出使期间,所有成员们均与选派他们的机构保持书信联系,随时将他们在各地的观察和搜集的资料连同报告和产品样本、原料、绘画、工具及植物种子等,沿途寄回法国。除了有助于法国工业发展的讯息以外,他们还注意参访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种族、政治和经济情况,并加以详细描述。由于使团成员们每到一处即与当地政府、法国和其他欧洲外交人员、商人、工业家或驻留当地的军队以及一些学会接触,是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搜集到非常丰富而有用的讯息。此外,他们随行亦携带法国工业制品的样本,以便在中国和南洋地区展示,同时分发给手工业者们试用,为法国工业品海外市场的开拓铺路。

1845年使团和商业考察团在华考察结束后,团员和工业代表们各自取道归国。使团和考察团成员寄回或携回法国的原料和产品,成为法国工业研究者和工商业者们研究比较的样品,以及外来物种驯化试验的对象。考察团返法后接下来的几年,陆续在巴黎、里昂和圣·提昂(Saint Etienne)举办了三场展览,展示成员们在远东各地所搜集的原料、产品、样本、工具、绘画及模型,以及法国业者针对采集样品所进行的试验和仿制成果。多位使团成员和商业代表将出使中国沿途的所见所闻以游记的形式出版,其中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中国城市的描述与记载,补充了中国历史记载和文献所未提及的城市景观、日常生活和生产状况,以及对于中国人物的描写——其中包含对清末一些与西方交涉官员的描述与评价,提供现代史学研究者从不

① 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照笔者收录于即将出版的 *Les échanges franco-chinois du XIX^e siècle; la Mission de Lagrené (1843—1846)*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IHEC)一书中的论文:“La mission en Chine de Lagrené et sa signification”。在此合著中有关于使团和附属考察团成员详细的研究。

② Jules Itier, *De la Chine considérée du point de vue du débouché qu'elle peut offrir à l'industrie viticole*, Montpellier; Typographie de Pierre Grollier, 1849 (Extrait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griculture de l'Hérault*, mai, juin et juillet 1848), p. 18.

同视野观察中国社会,以及在对外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研究的宝贵资料。其实在筹备使团和商业考察团派遣之初,法国相关机构即利用多种管道搜集并翻译大量有关东南亚贸易的资料,中国海商在该地区的活动为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中法交涉和等候换约期间,使团和商业考察团成员曾多次进出东南亚海域,且在南洋地区停留较长的时间,对当地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丰富而详细的记载。大多数的工商业代表——特别是赫德——均对历史研究情有独钟,对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和在当地进行的商业活动和生产内容与影响,均有相当篇幅的详细研究与考证,提供学者们有关清代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历史研究的线索。

由于拉萼尼使团和附属考察团的组成由多个机构共同筹办、推选,与该使团相关的文献史料和出使文件,以及沿途考察的丰硕成果,现今分散保存于几个法国国立、市立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多处国立、地方和私人机构:如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收藏了法国与中国间外交协商的原稿、通讯稿以及使团成员的资料;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存有商业代表团的组织过程和代表选派资料的原件或副本,以及代表们寄回农商部的报告和少量的样品。至于从远东带回来的各种原料、手工业生产样品、工具、模型和画册、图像等等,则散见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相关的工、商业博物馆或档案馆,如法国国立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的图书馆和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以及圣·提昂市立博物馆(Musée d'art et d'industrie de Saint-Etienne)等单位。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法国创设了驻上海副使(Vice consul)的职务,任命拉萼尼全权特使的秘书蒙题尼(Charles de Montigny, 1805—1868)为第一任副使。驻上海期间,蒙题尼以黄埔条约中有关天主教条款的诠释和驻扎在上海外海的军舰为后盾,继续对中国原料生产和手工业进行调查,并试图利用天主教的影响力发展法国的对华贸易,可惜蒙题尼的尝试与努力并未受到法国在华的外交团体的认同和法国工业人士的支持而告失败^①。但是蒙题尼对中国资源积极的发掘与搜集,将大豆和为数颇丰的稀有动物引进法国,对动植物物种在法国的引进与驯养具有相当大的贡献。

^① 有关蒙题尼的生平可参阅 Jean Fredet, *Quand la Chine s'ouvrait; Charles de Montigny, consul de France* (当中国大门开启:法国大使蒙题尼),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53(1^{ère} éd., 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43).

三 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

19世纪下半叶,清廷数次与欧美列强交锋失利后,又签订了多个通商条约,通商口岸亦由沿海地区延伸到长江内陆口岸,欧洲人到中国内地旅行的人数亦与日俱增,大量的中国游记陆续在西方出版,并获得良好的回响。事实上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多位传教士和旅行家秘密潜入中国内地,并留下许多引人入胜的游记^②。18世纪40年代初,遣使会的教士葛倍(Joseph Gabet, 1808—1853)^③和助理聿珂(Evarist Huc, 1813—1860)为了推展教务,由澳门出发,经重庆、成都和武汉等地区,抵达拉萨,对西藏地区和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调研。聿珂后将此行以《1844—1846年间鞑靼和西藏地区旅行的回忆》(*Souvenir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hibet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为名出版,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从1850年初版到1868年再版了最少七次之多。其中对四川、云南的历史、建置和风情有初步的介绍。

随着19世纪殖民主义的迅速扩张,西方强权国家的科学探险队之足迹亦深入世界各地。中国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吸引了欧洲科学家们的注意,四川和云南等西南地区所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引起英、法两国的觊觎;多个探险与调查队伍在政府、教会、地理学会或商会的赞助下派遣至中国西南省份,对当地的人文、地理、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特别是法国,从17世纪末开始,在远东贸易被葡、西、荷、英抢尽先机的背景下,即希望能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深入中国腹地,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9世纪下半叶法国势力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为其扩展远东势力政策的成果之一,同时亦提供了继续深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据点。18世纪60年代晚期开

^②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在换约生效之前,伦敦皇家植物学会(Royal Horticulture Society)已派遣福钧(Robert Fortune, 1812—1880)至中国东部进行植物品种和种子的采集。1848年福钧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到中国考察茶叶的种植与生产,终将茶种和茶农引进印度,而达到茶叶生产的目的。福钧留下两次中国旅行的游记: *Three Years' Wa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 with a Short Notic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Mountains.* London, John Murray, 1852.

^③ 葛倍于1836年加入蒙古传教会(Mission de Mongolie),于次年三月抵达教区,在黑水一带居住了多年时间。详 Paul Pelliot, "Le voyage de MM. Gabet et Huc à Lhasa", *T'oung Pao*, 2e série, vol. 24, N° 2/3, 1925—1926, 页 135—136。伯希和在本篇论文中对噶贝和聿珂的背景以及在拉萨的旅行做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

始,多支科学探险队均由法属越南出发,对中南半岛和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的科学调查,其主要目的在寻求新的与中国贸易的路径,以获取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开发潜在的消费市场。

1858年,拿破仑三世(1852—1870在位)决定开始向中南半岛出兵,在占领岷港、柴棍(西贡,今胡志明市)、南圻等地后,于1864年建立保护国(protectorat)交趾支那(Indochine)。1866年,在法皇的支持和皇家地理学会的赞助下,法国海军部派遣海军中校刺葛(Ernest Doudard de Lagrée, 1823—1868)率领主要由海军成员组成的科学探险队实地探勘湄公河的可航性,以建立中国南方和交趾支那的贸易关系,同时展示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探险队于柴棍出发,沿湄公河溯流而上,随团有负责水文、气候和地图测绘的海军上尉噶尼叶(Fancis Garnier, 1839—1873),负责植物学研究的外科军医铎黑勒(C. Thorel, 1835年左右出生),随队医生同时也是地质学家的儒备(Joubert),摄影师芥协勒(Emile Gsell, 1838—1879)、负责绘画和建筑的海军军官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 1842—1925)^①以及外交部专员卡内(Carné, 1842年后出生)。1868年,刺葛在云南去世后,探险队在噶尼叶的指挥下完成任务。此次的考察结果涵盖层面广阔,除了详细观察越南、寮国、柬埔寨和中国西南地区的贸易交通网络、运输方式(图二)、自然资源(植物、矿藏、工业原料)的分布与生产方式,还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调查。此次的考察成果由噶尼叶执笔撰写,分别发表于《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地理学会学报等期刊,噶尼叶去世后,其兄将其手稿补充整理后出版,于1880年代开始,噶氏的遗著《印度支那的探险之旅》(*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曾多次出版。噶尼叶的科学探险为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开创新例,1870年以后,许多科学家和探险队在法国海军部、地理学会、商会或其他商业机构的赞助下,先后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科学探险和考察,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满清失去对安南的宗主权,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亦迅速扩张,与清朝的西南疆界划分,成为19世纪末中法关系的要点之一;由于之前满清和越南两国疆界并未直接接壤,边境地带多未开垦丛林,舆图界限多模糊不清(图),越南成为法属地后,成为法国政府关心的重点之一;法国商会亦视中南半岛为发展法国远东贸易的基点。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与西方和日本强权在中国更大的商业利益与权力,里昂商会邀请其他五个城市(波尔

多、里尔、马赛、卢贝、卢昂)的商会,共同组织商业探险远征队,纺织业的原料和成品销售市场的探勘为这些商会关注的重点,队员成员中大半来自于纺织工业:两位出身于里昂的丝绸工业、一位来自里尔(Lille)的麻纺织工业、一位来自鲁贝(Roubei)的羊毛工业和一位来自卢昂(Rouen)的棉花工业代表;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殖民贸易、矿业、食物跟医药的探勘和调查。此行的主要目标有三:(一)寻找从南方进入中国腹地的最佳商业路线;(二)确切了解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生产跟消费能力;(三)寻求可以取代当时普遍使用的经由西江从广州到东京的交通路线。商业远征队于1895年9月15日离开马赛,在抵达法属越南的海防市(Haiphong)后,开始执行此行任务,在四川和重庆一带停留数月的时间。从远征队成员和里昂商会的通讯以及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成员们不仅详细纪录了他们在当地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搜集了旅华期间中国所发生事件的相关讯息。消息的来源可能来自当时居留在中国的法国外交人员、军人、商人或传教士,同时也将其他欧洲语文的相关报导和文件翻译成法文。此次调查的结果,于远征队返回法国的次年(1898)出版,书名为《1895到1897年间里昂在中国的商业探勘》(*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1895—1897*)。

法国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特别是彝族的研究,亦留下了丰富的成果^①。1898年的夏天,一位法国中亚探险队(Mission française d'exploration en Asie centrale)的成员佛勒协赫子爵(Vicomte Vaulserre)在扬子江上游进行地形探勘的工作。在当地四个月的旅行之后,完成地势探勘的工作,并搜集了两张用于平定和防止彝乱的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军事地图。由于彝族(中文文献中的罗罗)文化与汉文化传统的差异,彝族向为官方视为蛮族,在中国传统的史料文献记载中,除了彝族与官方的军事冲突外,仅有非常少数关于彝族的描述。1728年,“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到西南省份,以中央选派的官员取代当地土著首领,而引起了地方的叛乱。直到清末民初,该地区彝汉间的冲突仍持续不断。佛勒协赫子爵在西南地区勘测的同时,对当时西南地区的社会和汉族跟彝族之间的冲突也进行了观察纪录^②。

中国西南边境的民族问题亦受到法国探险队的注意,1906年陆军军官欧

^① 高迪爱在其论文“Les Lolos, état actuel de la question”(罗罗,问题的现状), *T'oung Pao*, 2nd serie, vol. 8, n° 5, 1907, 页 597—686)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几个曾经到大凉山考察的法国科学探险队伍,如: Vaulserre, 欧龙等。在文中作者对有关彝族记载的中文文献、英法对该主题的相关调查和结果报告,以及英文文的中文文献翻译均有详细的介绍。

^② *Note relative à la carte représentant les districts chinois de Loui-po, Pin-chan-Hien et de Mapien dans le Sé-Tchouen*(有关四川雷波、屏山县和马边地图的注释)。

^① 德拉波特撰写的 *Voyage d'exploration du Cambodge*(Paris: Ed. Delagrave, 1880, 1999年 éditions Maisonneuve et Larose 出版社重新刊印发行)。

龙(Henri d'Ollone, 1868—1945)对中国非汉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种族、文化、历史进行为期三年的深入考察。欧龙在传教士哥毗安神父(Guébriant)、上尉军官乐芭若(Léon Lepage)和士官巴勇(Boyve)的陪同下,由宁远穿越大凉山,经雷波厅、黄坪于1907年六月到达绥府。欧龙除了对彝族的考察赋予特殊的关切以外,还特别注意回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穆斯林的观察,留下了许多相关的记载和有关语言学的论述^①。

事实上,法国传教士很早就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彝、苗等)相当关注,在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考察报告和搜集的文献中,即包含关于少数民族记载的资料^②。即便在满清禁教最严苛的时期,许多传教士仍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同时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文化进行观察纪录,搜集当地的文献、手稿,并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之后的一些科学探险队或私人考察都对相关问题给与相当的关注,留下丰富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这些材料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与汉籍、文献对照,对汉族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冲突进行较客观的分析,同时可补足汉文史料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社会等面向记载之不足。

小 结

法国在发展远东贸易以及法国工业生产的前提下,从17世纪末起开始公开或秘密地派遣了为数可观的人员到中国进行文献、史料、样品和文物的搜集,同时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与观察的工作。从早期与传教结合而派遣的耶稣会士和外方传教士,到19世纪中叶开始由海军部、商会与学会组织的科学探险队或商业考察团,随着法国的科学发展与政治制度和远东政策的演变,对华调查的人员和调研目的与方式亦有所改变。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调查和藉由耶稣会进行的中西交流吸引不少历史学家的注意,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均关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和科学交流。从17世纪末法国得以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观察与资料搜集开始,即尝试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面向,作整体而深入的观察、纪录与分析。从耶稣会士搜集的材料和出版文献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关心的面向涵盖历史、政治、宗教信仰、科学(如:医学、本草、数学、天文学、自然史)、农业和原料生产、工艺生产知识与技术(纺织工业、制陶业、漆器等)等面向。法国观察者对

^① Henri d'Ollone, *Mission d'Ollone, 1906—1909. Les Derniers barbares* [Texte imprimé], *Chine, Tibet, Mongolie*, Paris, P. Lafitte, 1911; *Mission d'Ollone, 1906—1909. Écritur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quatre dictionnaires "Lolo" et "Miao Tseu"*, Paris, E. Leroux, 1912.

^②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Paris, 1904—1924.

中国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描写与评论,提供现代学者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与描写的视野,补足一些为传统中国文人所略而不述的层面,提供学者从不同角度更深入地分析、探讨清代中国社会的依据。两个多世纪以来法国耶稣会士、外交人员、使团和考察团成员、商人、海军等对中国传统世俗生活、手工业制作、城市跟乡村外貌以及异族文化跟生活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文献和材料。

许多现代学者已使用一些英文的调查文献对清代的几位历史人物,如耆英(1790?—1858)和广州的行商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法国访华使团成员留下的文献和报告同样也为与他们接触过的中国官员、行商或人民提供了丰富的记载和描述,然目前仍鲜为史学研究者利用。这些记载或许并不全然客观,但却提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不同角度的观察与描写,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需要与中文或其他西方语言的史料进行对照、比较,以便对此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作更全面而客观的审视与观察,进而对地位较敏感的历史人物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使团派遣的本身即为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透过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法国对华调查人员和使团派遣的研究可以对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除了对外政策还包含与法国商人、外交代理人、军队与中国官员及一般民众间的关系,甚至包含中国科技水平还有西方经济利益,这对考虑当时西方世界的演变都是必需的资讯。透过法国人在中国成功获得资讯的方法,特别是一些实用的材料,像是军事地图,这对于观察中国与法国或欧洲间不同的概念跟价值观具有珍贵的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评论使团与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间微妙却又紧密的关系。

参考书目

史料

d'Ollone(Henri), *Mission d'Ollone, 1906—1909. Les Derniers barbares* [Texte imprimé], *Chine, Tibet, Mongolie*, Paris, P. Lafitte, 1911.

—*Mission d'Ollone, 1906—1909. Écritur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quatre dictionnaires "Lolo" et "Miao Tseu"*, Paris, E. Leroux, 1912.

Du Halde (Joseph),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ibet et de la Corée*, la Haye, chez Henri Scheurleer,

1736(2e éd., 1ère éd. en 1735).

Ferrière le Vayer (Jean—Théophile de), *Une ambassade française en Chine*, Paris: Amyot, 1854.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ohn Murray, 1847;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 with a Short Notic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Mountains.* London, John Murray, 1852.

Guignes (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Voyage à Pé—King [Pékin] de Guignes* (1808).

Hausmann (Auguste),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Paris: G. Olivier, 1847, 3 tomes.

Hedde (Isidore), *Description méthodique des produits divers recueillis dans un voyage en Chine*, Saint—Etienne: Imprimerie de Théolier aîné, 1848.

Hunter (W. C.), *Bits of Old China* (中译本: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

Itier (Jules),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Paris: chez Dauvin et Fontaine, libraires—éditeurs, 1853.

—*De la naturalisation en France et en Algerie de plusieurs plantes textiles originaires de la Chine, et de let de liles originaires de la Chine, et de l. etc. c. tc. ts, etc.*, Montpellier plantes texie de Pierre Grollier, impri. De la Soci Soci la Soci de Pierre ires dExcerpt of the *Bulletin de la Soci la Soci de Pierre ires de la*, avril, mais et juin 1850.

—*De la Chine considérée du point de vue du débouché qu'elle peut offrir à l'industrie viticole*, Montpellier: Typographie de Pierre Grollier, 1849 (Extrait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griculture de l'Hérault*, mai, juin et juillet 1848).

Julien (Stanislas), Champion (Paul),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Eugène Lacroix, 1869.

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1895—1897, Lyon: A Rey et C^e impr. éd., 1898.

Lavollée (Charles), *Voyage en Chine de Lavollée*, Paris: Juste Rouvier; A. Ledoyen, 1852.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Toulouse: Imprimerie Noël—Etienne Sens et librairie Auguste Gaude.

Poivre (Pierre), *Voyage d'un philosoph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oeurs et les arts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de l'Asie et de l'Amérique* (哲学家游记, 又作: 关于非洲、亚洲和美洲人民的风俗和工艺的观察), Yverdon, 1768.

—*Voyage de Pierre Poivre de 1748 jusqu'à 1757* (1748至1757年间皮耶·都佛的游记),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18.

Delaporte (Louis), *Voyage d'exploration du Cambodge* (Paris: Ed. Delagrave, 1880, 1999年 éditions Maisonneuve et Larose 出版社重新刊印发行).

Vaulserre, *Note relative à la carte représentant les districts chinois de Loui—po, Pin—chan—Hien et de Mapien dans le Sé—Tchouen.*

中文书目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

黄时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葛夫平:《法国与鸦片战争》,《世界历史》,2000年5月,页50—58。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

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西文书目

Belevitch—Stankevitch (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thèse de doctorat d'université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Jouve et C^{ie}, 1910

Cartier (Michel), *La Chine entre amour et haine*, actes du XVIII^e colloque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Paris: Institut Ricci, 1998.

Cordier (Henri), *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en Chine initian* (18世纪在中国的法国,未发表的文献), Paris: Ernest Leroux, 1883.

—*Les origine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Extrême—Orient, Chang—Hai—Ning—Po* (法国在远东两个机构的起源:上海和宁波), Paris: [s. n.] 1896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elatempir echinois, Paris: 1904—1924, 5 vols.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e bois de Jancigny de*, Paris: dans *bois de Jancigny* Larose, 1916 (Excerpt of the *Revue de l'Asie et des Colonies franse*, 1)

—“Les Lolos, état actuel de la question” (罗罗, 问题的现状), *T'oung Pao*, 2nd serie, vol. 8, n° 5, 1907, 页 597—686.

Dermigny (Louis),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S. E. V. P. E. N., 1964

Hashimoto (Keizô), Jami (Catherine), Skar (Lowell) (éds.), *East Asian Science: Tradition and Beyond,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Kyoto, 2—7 August 1993*, Osak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95.

Haudrière (Philippe),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Trois siècles de rencontre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eds: Desjonqueres, 2006.

Jacobson (Daw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3.

Landry—Deron (Isabelle),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Lee (Thomas H. C.) (éd.),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lleret (Louis), *Les mémoires d'un voyageur: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Pierre Poivre* (一个旅者的回忆录: 皮耶·鄱佛未发表的手稿),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8.

Mau Chuan—hui 毛传慧,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ériciculture chinoise, fin XVII^e—fin XIX^e siècles”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末法国对中国蚕桑业的调研),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Centre historique de documentation des techniques, 2007, nouvelle série n° 14, p. 24—36.

Maverick (Lewis A.),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Texas: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 2 vol. in 1.

Montigny (Charles de), *Manuel du nharles de*, 1946, 2 vol. in 11. in 1 *Ifin XVIIhteenth Centuries August 19e franansh*, Paris, 1846.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1929, 5 tomes. 中译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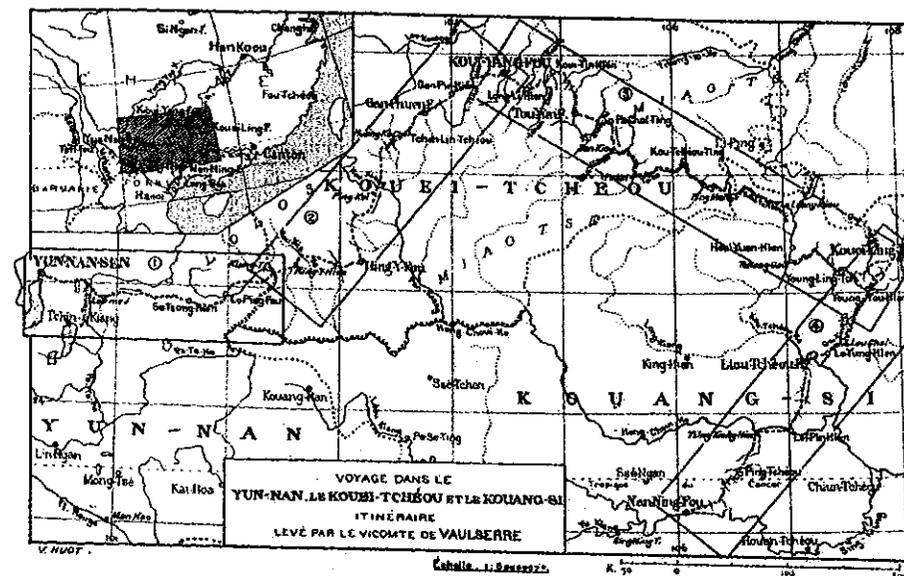
Pelliot (Paul), “Le voyage de MM. Gabet et Huc à Lhasa”, *T'oung Pao*, 2^e série, vol. 24, N° 2/3, 1925—1926.

Pinot (Virgile),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2.

Ronan (Charles E.), S. J. et Oh (Bonnie B. C.) (é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Roberts (J. A. G.),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teenth Century, a Reader in History*, Phoenix Mill, Alan Sutton Publishing, 1991. (translated in Chinese by 蒋重跃, 刘林梅:《19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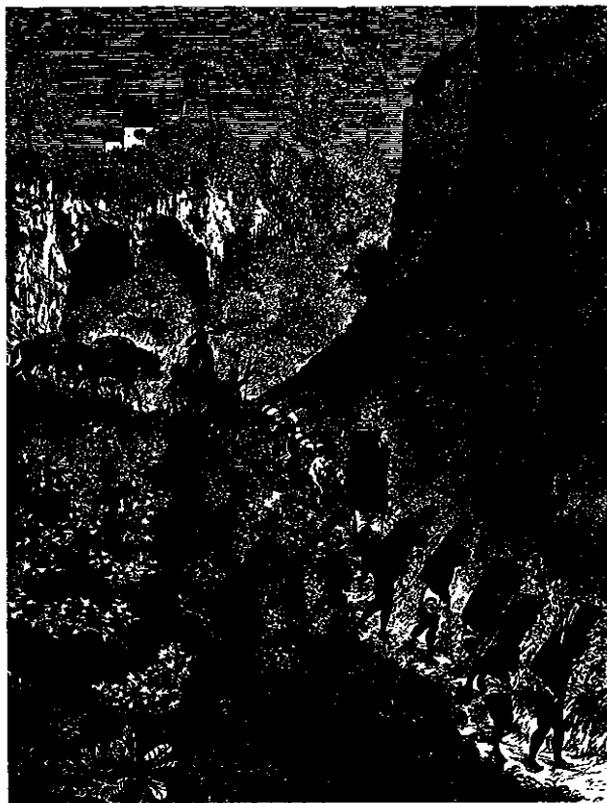
Rochemonteix (Camille de),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钱德明与驻北京的最后几位法国传教士), Paris: Librairie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1915.



Vaulserre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路径



Jules Itier 在拉萼尼与耆英签订中法条约后,在法国蒸汽战舰上拍摄的合影。
(银版藏于法国摄影博物馆)



Garnier 率领的科学探险队留下的云南地区运输方式(Delaporte 绘制)